

Doi: 10.20063/j.cnki.CN37-1452/C.2026.01.009

# 传统与现代之间:《妇女杂志》早期(1915—1920)的西方女杰形象译介与重构

赵玗翠,马士奎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妇女杂志》(1915—1920)对西方女杰的形象译介,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及刊物“贤妻良母”的核心宗旨指引下,重构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女性现代性想象。《妇女杂志》译介选材聚焦18—19世纪活跃于教育、艺术、科学、慈善等非政治领域的女性历史人物,塑造温和保守的女性典范形象。《妇女杂志》在译介实践中则多以增、减、改等译法,突出她们道德高尚、博爱奉献与兼顾家庭的形象特质。上述译介形象实为传统“贤妻良母”规范与现代公共参与意识相妥协的产物——既以社会奉献之名拓展女性公共空间,又以家庭责任与传统道德维系既有性别秩序。西方女杰的形象译介不仅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更是深层次的文化协商与话语建构,映现出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的困境中重构理想女性形象的复杂实践。

**关键词:**《妇女杂志》;西方女杰;形象;译介;重构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6)01-0064-08

在近代中国追寻现代性的曲折进程中,“妇女问题”绝非一个孤立的议题,而是与国族建构、文化转型紧密交织的核心场域。其中,西方女杰的译介不仅是对女性个人成就的传播,也是现代性话语建构的重要环节。这一译介活动始于清末,当时的女性报刊如《女学报》《女子世界》等曾是传播此类形象的重要载体,其所呈现的西方女性典范涵盖爱国、革命与女权等多重面向。这些形象经清末知识分子的筛选、翻译与创造性重构,将“女权”“国民之母”“革命”等现代概念具象化,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一股重要文化动力<sup>[1]</sup>。进入民国后,革命的风潮暂歇,政局逆转,袁世凯政府的政治高压与文化复古政策,迫使妇女解放的话语路径发生根本性转轨,对异域女性典范的译介图景和译介策略也随之转变。

作为20世纪前半段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女性期刊<sup>[2]61</sup>,《妇女杂志》(1915—1931)在办刊早期(1915—1920)恰好处于袁世凯的高压复古统治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关键历史夹缝之中,这一独特的历史位置,使其西方女杰译介实践内在地充满了保守与现代的张力:它一方面要引入代表

“现代性”与“进步”的西方榜样,另一方面又须审慎地考量传统性别秩序的边界。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女杰译介实践正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观察样本,展现新旧过渡时期女性形象译介和重塑策略的变迁。

然而,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仍显不足,现有成果中以任淑静与张会丽的研究最具关联性<sup>[3-4]</sup>。任淑静聚焦于译文,从人物外貌、语言及心理三个维度对西方女杰形象进行分析,但其研究一方面局限于个别女杰形象译文,未能覆盖更广泛的译介文本;另一方面又集中于形象描写词汇的翻译,未充分关注译文中的其他互文信息,因此其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有所欠缺<sup>[3]</sup>;张会丽则着力于《妇女杂志》中的西方科学女杰形象,从外貌、性格与学术气质入手,揭示了其背后隐含的性别话语,但该分析未能将这些形象充分置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阐释,从而未能深入揭示形象建构与外部历史张力之间的动态关联<sup>[4]</sup>。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尚未能系统、全面地展现《妇女杂志》在译介西方女杰过程中所进行的复杂话语协商。

基于此,本文以1915—1920年《妇女杂志》

收稿日期:2025-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学著作百年汉译与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构建研究”(24BY095)

作者简介:赵玗翠(1983—),女,山东诸城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马士奎(1967—),男,山东费县人,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的西方女杰译介为个案,旨在探讨以下问题:该刊如何在“贤妻良母”的保守宗旨与现代性诉求之间相互妥协?翻译作为一种能动的文化实践,如何通过有意识的筛选、改写等一系列操作,参与转型期女性形象的塑造与现代性想象的建构?为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纳话语分析与翻译研究的双重视角,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语境化方法,考察《妇女杂志》在引介西方女杰过程中的选材偏好、译介手法与形象建构逻辑。研究指出,该刊通过突出道德高尚、家庭兼顾与社会奉献等特质,塑造出一种“保守化现代女性”的典范,既拓展了女性的公共角色,又维系了传统的性别秩序。这一案例不仅能够揭示译介行为背后的文化政治,也为我们理解民初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协商提供了新的视窗。

### 一、新女性形象的意识形态张力:历史语境与杂志取向

《妇女杂志》于1915年1月5日在上海创刊,系一份由妇女杂志社编辑、商务印书馆主办发行的综合性商业女性月刊。其时,中国正处于袁世凯的高压统治之下。在新闻出版方面,政府强化舆论管控、压制言论自由,特别是1913年“癸丑报灾”后,频出的新闻规制与禁令使全国出版业陷入低潮;在妇女问题方面,袁世凯极力压制妇女参政运动,鼓吹节妇烈女,提倡“贤妻良母”。《袁世凯颁定教育宗旨令》明确规定“他如女子则勉为贤妻良母,以竞争于家政”<sup>[5] 32</sup>,并严厉禁止女子涉足政治“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sup>[5] 33</sup>。在这一政治思想环境下,那些宣传革命话语和政治立场鲜明的女性报刊大量被取缔。虽然官方性别政策和维护传统的言论声势强大,却并未真正消解社会层面正在形成的对“女性作为现代主体”的追问。妇女问题仍是民初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议题,只是讨论方式处于被迫降调的状态。许多报刊杂志持续刊登欧美女权运动的新进展和各国妇女的现状,民众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接受度比帝制时期更广<sup>[6] 35</sup>。

这一背景使众多出版和媒介机构在面对妇女问题时陷入了两难:既不能违逆官方政策,也无法忽视读者对“新女性”形象的探寻。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务印书馆,面临的正是这种困境。为确保发行效益与政治安全,它必须避免激进女权话语;而作为当时最大的教科书出版机构,它的教育

理念也要与政府的教育方针保持一致。因此,《妇女杂志》在办刊早期明确以中学及以上程度的女学生和家庭妇女为目标读者,以培养“贤妻良母”、传播女学为核心的稳健保守宗旨:“……本杂志以提倡女学,辅助家政为宗旨,而教养儿童之法尤为注意,既足为一般贤母良妻之模范童蒙养正,又为研究教育者所必当参考之书”<sup>[7]</sup>。另一方面,《妇女杂志》又需要回应城市知识女性群体对于自我修养、新知识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期待。因此,杂志虽将女性现代化限定在家庭领域内,但这种“温和现代化”本身,就是在维护传统家庭伦理与吸收新式女性主体性之间不断调适的结果。

1915—1920年的编辑实践进一步体现了这种折中策略。《妇女杂志》这一时期的主编是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王蕴章和留学归国的知识女性胡彬夏(其中王主编1915年第1卷、1917年第3卷至1920年第6卷;胡主编1916年第2卷)。王蕴章(1884—1942)是江苏无锡人,字蕤农,号西神残客。作为南社早期成员和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他属于新旧文化过渡时期的人物。1915年起他担任《妇女杂志》主编,几乎独立承担了整个编辑部的工作<sup>[8] 164</sup>,该刊的宗旨与内容基本反映其个人的立场与倾向。王蕴章虽未直接撰文申明其妇女主张,但他以“西神”“蕤农”等笔名发表的百余篇文稿,始终聚焦“家政”与“学艺”领域,清晰呈现出其培养“贤妻良母”的核心办刊导向。为提升杂志影响力,1916年起,商务印书馆聘请曾留日、留美的女界名流胡彬夏担任主编。胡在留日期间曾是积极的女权主义者,组织过爱国团体“共爱会”,并在其中倡导男女平权理念。然而,赴美留学后,她的妇女观发生根本转折,摒弃了妇女积极干政的主张<sup>[9]</sup>,转而强调女性的家庭职责,主张妇女应以“改良家庭”这一“极伟大之事业”为根本<sup>[10]</sup>。她笔下的“新女子”们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投身职业,但其核心角色却是家里的贤妻良母<sup>[11]</sup>。因此,在坚持女性以家庭为根本这个立场上,胡彬夏的观点与传统的“贤妻良母”取向一致,这使其思想成为一个新旧杂糅的矛盾体。1917年1月,王蕴章再度接掌主编之职,直至1920年末,因杂志保守立场在五四后招致强烈批评,所推改革又成效不彰,他最终辞去主编职务。在此期间,王、胡二人虽都承认女性可受育、甚至就业,但均将女性核心价值定位于家庭。也就是说,《妇女杂志》表面上倡导女性地位提升,实则

通过论述策略与典范塑造,将女性的现代主体性收编入家庭伦理之中。

由此观之,《妇女杂志》(1915—1920)对西方女杰的译介,是在官方“贤妻良母”政策与女性解放诉求的动态博弈下展开的复杂文化实践。袁世凯政府鼓吹“贤妻良母”、压制妇女参政的高压统治,为整个文化生产体系设定了必须遵循的宏观意识形态框架。在这一政治压力下,作为提供资金与出版渠道的赞助者,商务印书馆营利性的目的和教科书出版商的身份,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取向必然与官方方针保持一致;它所设定的稳健、保守的办刊宗旨,为杂志划定了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与经济边界。然而,商务印书馆并未直接干预编辑事务,而是赋予专业主编较大的自主权。王蕴章与胡彬夏的个人意识形态与诗学取向直接影响了译介内容和译介策略的选择。与此同时,以中学以上女学生和家妇女为主的读者群体对现代女性的想象与追求又形成了杂志外部的诗学期待视野。因此,杂志既要引入新式女性形象来回应读者的女性现代性诉求,又必须通过选择性取材与道德化重述来避免冲击传统家庭秩序,在“启蒙”与“教化”之间寻求平衡。由此,《妇女杂志》的西方女杰形象译介与重构,正是在多重力量交织、制约与协商中形成的产物。

## 二、西方女杰形象的选择:时代与身份的调和

《妇女杂志》对西方女杰的选译并非随意为之,而是一种基于政治文化语境和办刊宗旨的策略性编排。该阶段共刊载相关文章13篇<sup>①</sup>,介绍11位西方女杰的生平事迹(见表1)。从时代分布来看,仅有两位属同时代女性,其余9位均是生活于18—19世纪的历史人物。这些女杰多为西方步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先驱,活跃于西方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在她们所处的时代,英国所推崇的理想女性形象是“家中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sup>[12]</sup>,而美国主倡“纯美女性”(True Woman)<sup>[13]</sup>。尽管名称各异,这两种理想女性形象在本质上高度契合,其核心美德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虔诚(piety)、纯洁(purity)、顺从(submissiveness)与持家(domesticity)。这种“厚古薄今”的选译策略,与五四后聚焦当代女性的选择倾向形成鲜明分野,它根植于早期杂志稳健保守的办刊宗旨,意在借助历史女杰身上相对传统的特

质,缓和新女性形象对固有性别秩序的冲击,从而构建一种更为温和、具调和色彩的现代女性想象。

从职业身份来看,这一时期的女杰有科学家(3篇)、教育家(4篇)、文学家(3篇)、画家(1篇)、慈善家(1篇)及歌唱家(1篇)。值得注意的是,在4篇女教育家传记中,有3篇的传主实则均为美国教育家玛丽·丽安(Mary Lyon),只是文中呈现的译名不同<sup>②</sup>。该现象表面上反映了译名规范的缺失,实则凸显了杂志的价值取向——对女教育家这一群体的格外推崇。其原因则深植于理念与现实的交汇点:在理念层面,教育职业被认为是“适合女性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母性的职业”<sup>[14]</sup><sup>32</sup>,契合“贤妻良母”的母职期待;在现实层面,教师职业是当时中国知识女性最主要的出路<sup>[15]</sup><sup>29</sup>。此外,文学家、艺术家与慈善家等被视为女性进入公共视野的“温和”途径,既未强烈冲击性别秩序,又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对妇女角色的期待。科学家的译介则服务于该杂志以科学知识赋能现代主妇、推进女子教育现代化的目标<sup>[2]</sup><sup>63</sup>,因此同样得到重点译介。

在这一阶段,女政治家、女革命家与女权主义者等激进人物是完全缺席的,这与清末时期西方女杰译介中“革命”与“女权”的重要主题<sup>[1]</sup>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爱伦·凯(即译文中的爱伦幹)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女权主义者,其妇女思想尤其是婚恋观在五四时期的《妇女杂志》上被大量刊译,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但此时的杂志却仅突出其作为教育家的身份,对其女性主义立场仅以“对于女子参政运动问题,亦多有发表己见之作”<sup>[16]</sup>一笔带过。连载传记《泰西列女传》同样反映出女杰选译的保守倾向。该书译自博尔顿夫人(Mrs. Sarah K. Bolton, 1841—1916)所著的*Lives of Girls Who Became Famous*(1914),书中共收录19位在不同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西方女性。该书从中选译了7位女杰的传记,包括文学家、教育家、天文学家、画家和慈善家,而原书中3位19世纪女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均未得到译介:卢克雷霞·莫特(Lucretia Mott, 1793—1880)

<sup>①</sup>包含各领域的成功女性的传记、事迹介绍,排除仅提及姓名的简讯。数据源自逐期检索《妇女杂志》影印本(上海书店,2017年)。

<sup>②</sup>《美国女教育家密里来恩传》(1916年3期)、《美国教育家梨痕女士传》(1916年12期)、《泰西列女传:丽安女士传》(1917年9期)均以美国教育家Mary Lyon为传主,只是其译名各异。为方便起见,本文统一采用“玛丽·丽安”之称谓。

不仅是布道者与废奴运动积极分子,更是美国女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组织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塞尼卡瀑布会议(Seneca Falls Convention)积极倡导女性教育权、财产权与参政权;玛丽·利弗莫尔(Mary A. Livermore, 1820—1905)作为演说家与社会改革家,曾出任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主席及美国妇女进步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首任会长;玛格丽特·富

勒(Margaret Fuller Ossoli, 1810—1850)则是新闻工作者与女权思想家,其著作《十九世纪的妇女》(*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被公认为美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奠基文本,强调女性应具备独立人格并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与教育机会。原作中3位具有鲜明女权意识与社会行动力的西方女杰,均被排除在译介对象之外,这清晰反映出《妇女杂志》在引介西方女杰形象时的去激进化立场。

表1 从1915年1期至1920年12期《妇女杂志》的西方女杰译介简表

序号	文献来源	文章题目	女杰姓名	国别	生卒年	职业
1	1915年第2期,第2-4页	女数学家古洼鲁斯克夫人传	Sofya Kovalevskaya	俄国	1850—1891	数学家
2	1916年第3期,第1-3页	美国女教育家密里来恩传	Mary Lyon	美国	1797—1849	教育家
3	1916年第12期,第1-3页	美国教育家梨痕女士传	Mary Lyon	美国	1797—1849	教育家
4	1917年第5期,第1-11页	泰西列女传第一:斯士活女士传	Harriet Beecher Stowe	美国	1811—1896	小说家
5	1917年第6期,第7-15页	泰西列女传第二:密且尔女士传	Maria Mitchell	美国	1818—1889	天文学家
6	1917年第7期,第1-9页	泰西列女传第三:罗莎·博纳尔	Rosa Bonheur	法国	1822—1899	画家
7	1917年第8期,第1-8页	泰西列女传第四:及克逊女士传	Helen Hunt Jackson	美国	1830—1885	诗歌和散文作家
8	1917年第9期,第5-14页	泰西列女传第五:丽安女士传	Mary Lyon	美国	1797—1849	教育家
9	1917年第10期,第3-11页; 1917年第11期,第8-16页	泰西列女传第六:爱梨阿脱女士传	George Eliot	英国	1819—1880	小说家
10	1917年第12期,第3-15页	泰西列女传第七:弗来女士传	Elizabeth Fry	英国	1780—1845	监狱制度改革家、慈善家
11	1919年第2期,第2-4页	爱伦幹女史传	Ellen Key	瑞典	1849—1926	教育家
12	1919年第9期,第1-4页	聪明之女郎	Lillian Russell	美国	1860—1922	歌唱家、演员
13	1920年第3期,第1-2页	谈屑:内助	Caroline Lucretia Herschel	英国	1750—1848	天文学家

### 三、西方女杰形象译介的文本实践:传统与现代的协商

《妇女杂志》通过对西方女杰的有意选择,塑造出一种偏向传统的、温和的、去激进化的女性典范图谱。然而,形象重构不仅在于传主筛选,更体现在翻译的能动性上:译者绝不仅是忠实还原女杰形象,更对这些形象进行了本土化改写。这一形象重构实际是译者在现代性追求与传统伦理延续之间寻求妥协与融合的过程。

#### (一) 修身之德:贞淑与朴素

袁世凯大力推行尊孔复古政策,妇女解放空

间遭到严重挤压。政府陆续颁布多项命令,旨在恢复传统“优良女德”。1914年3月11日,北京政府颁布《褒扬条例》,明确将妇女的节烈贞操列入褒扬范围。此后,报刊中宣扬贞节烈女的报道屡见不鲜。1920年以前的《妇女杂志》几乎每期都刊载颂扬妇女节烈行为的传记。另一方面,身处新旧过渡时期的女界,则出现了崇洋西化、竞逐物质与时髦的风气,这在浓厚的复古氛围中,迅速成为文化界的众矢之的。《妇女杂志》亦多次撰文抨击此类行为,指斥这些女性“日事斗珠竞翠,装奇作伪,一若天生为男子之玩物”<sup>[17]</sup>,还罗列“奢侈”“逸乐”“放荡”“偏私”“愚陋”“褊隘”“忌

妒”“阴毒”八大项为“女界之缺失”<sup>[18-19]</sup>。杂志对“女德”的强调,也深刻渗入其女杰译介实践中,成为塑造女性典范形象的重要内容。

在《泰西列女传》中,“列女”一词的选用,鲜明体现了杂志强调妇女道德的价值取向。该词源自刘向《列女传》,传统意义上指代“贞洁烈女”或“德性出众之女性”。译者采用这一具有深厚伦理内涵的经典语汇,其结果是将西方杰出女性的事迹与中国传统道德话语体系勾连在一起。尽管此时期杂志的女杰译介在主题上与杂志刊载的以中国“孝女”“节妇”为题的本土传记不同,但它与后者却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同样推崇传统妇女道德。此外,在这13篇文章中,有11篇以“某某传”为题,而五四后杂志的女杰译介绝少使用“传”字。这一差异不仅是标题用语问题,更折射出《妇女杂志》在不同阶段的价值导向差异。“传”作为中国传统史志文体,承载着鲜明的道德评判与典范树立功能。其目的不仅在于记录生平,更在于通过叙事建构可供效仿的道德楷模。在这一文体框架下,传主被赋予超越常人的地位,事迹也被赋予典范意义,形成一种“神圣化”的叙述效果。“传”的使用强化了文本的教化功能,使译介本身成为引导读者效仿的道德叙事。

在介绍教育家丽安女士的人生导师、以推动女子教育著称的美国教育家约瑟夫·爱默生(Joseph Emerson, 1821-1900)时,原文赞赏他开明的妇女教育方式及其成效: He discussed science and religion with his pupils, and the result was a class of self-respecting, self-reliant, thinking women.<sup>[20]126</sup> 其中,下划线部分“self-respecting, self-reliant, thinking”强调的是女性主体性与理性的觉醒,而译者则将其改写为“端庄、高贵之品格,且富果敢之心”<sup>[21]</sup>,转化为符合传统期待的德性气质(端庄、高贵),使西方女杰的形象更契合当时中国社会对妇女端庄稳重的期许,体现出近代中国传统女性教育的德性化、去思想化的倾向。

对女性名节的强调,也是这一时期女杰形象译介实践中的显著特征。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的案例中,她与同妻子分居的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 1817-1878)公开同居的行为,被其仰慕者视为“the great mistake of a very great life”<sup>[20]224</sup>(“伟大人生中的重大错误”)。原文对此事的叙述较为克制,仅承认其选择引发社会争议,并未展

开道德批判;而译者却强化了其中涉及的名节议题:

亲密踰朋友之分,颇为时人所指摘,蜚语流言,日盈于耳。素与女士交好者,深为痛惜,谓以女士有为之人乃昏懵至此,竟不顾嫌疑所在,名节所关也。<sup>[22]</sup>

译文明显加入了道德化的评判(“亲密踰朋友之分,颇为时人所指摘”)与社会舆论压力的渲染(“蜚语流言,日盈于耳”),以此强化道德谴责的语气,刻意营造丑闻氛围;更在文末插入对艾略特人格的直接定性(如“乃昏懵至此,竟不顾嫌疑所在,名节所关也”),从而将她塑造为因情感选择而丧失名节的负面形象。这一改写与五四时期杂志刊载的《英国女权运动的先驱》一文对艾略特的形象塑造形成鲜明对比,该文不但肯定两人的非婚同居关系,辩解“两人自己的感情和道德便是夫妇要素”,更赞扬艾略特“竭力排斥英国上中阶级婚姻制度的不良”<sup>[23]</sup>。

同样,对于符合名节期待的女性,译者则通过增饰与改写,在另一层面强化了这一标准。译者对慈善家弗来女士的形象塑造便是如此。作者描述她美丽优雅,在社交场合中备受瞩目,但她始终不失持重和自省,原、译文如下:

She was attractive in society and much admired. She writes in her journal: “Company at dinner; I must beware of not being a flirt, it is an abominable character; I hope I shall never be one, and yet I fear I am one now a little.”<sup>[20]242</sup>

译文:每临交际场中,宾客无不争先恐后,承迎色笑,而女士则淡然自若也。女士于其杂记中尝曰“余于宴会之际,无不战战兢兢,不敢跬步越礼。尝见女子于稠人广坐之中,放诞不羁,肆无礼法,心甚厌恶之。常自幸未尝染此恶习,然深惧中其毒而不自知也。”<sup>[24]</sup>

首先,“attractive”“admired”仅是如实描述弗来女士在社交场合颇具魅力、备受欣赏,原文中并没有“宾客争先恐后”的具体场面,也没有“淡然自若”的姿态描写;译文则构建了一个众人追捧与主角克制的强烈对比。其次,译文还营造了“战战兢兢,不敢跬步越礼”“自幸未尝染此恶习,然深惧中其毒”与“放诞不羁,肆无礼法”的自我约束、他人失范的对比。这些添加和改写把弗来

女士从一个自我反思的现代个体转变为一个在复杂社交场中恪守礼教、高度自律的传统妇德典范。

与《妇女杂志》此时期倡导的生活朴素、不事修饰的德行相呼应,女杰译介中对勤俭朴素特质的忠实再现与有意凸显,共同强化了这一道德取向:爱伦·凯之家庭“素以俭德闻于世”<sup>[16]</sup>;迦遯林女士“居破屋中,饮食粗粝”却“处之怡然”<sup>[25]</sup>;丽安女士“自奉极啬,不衣华服,布衣素裳,亲自浣濯缝纫”<sup>[26]</sup>,“所御蓝色之衣,为己所手织者”<sup>[21]</sup>;密且尔女士“平日淡妆素服,衣多黑色或灰色”<sup>[27]</sup>;弗来女士不御“珠玉绫罗”而取“荆钗布裙”<sup>[24]</sup>。此类对朴素生活的着重书写,通过剥离华服珠宝等物质符号,将女杰塑造为勤勉的“生产者”与“奉献者”,而非耽于享乐的“消费者”,为批判当时女界的“崇洋奢侈”之风提供了有力的西方论据,同时也塑造了一种以事业成就为导向、克制物欲的新女性理想形象。在此,节俭与理性、自制及公共意识形成有机联结,使传统意义上的节俭德行转化为服务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公德,实现了传统美德的现代性转化。

## (二) 国族公德:博爱奉献

自清末起,中国知识精英在建构现代国民国家的诉求下,常批判中国女性囿于私情,缺乏西方女性那种对国家与种族的宏大之爱。1906年,《女子世界》主编丁祖荫(笔名丁初我)在《哀女种》一文中,便指出中国女界的劣根性,认为“其不良遗传者有三”,即“非爱种”“非侠种”“非军人种”。其中,第一位的“爱种”之“爱”,是排除“男女之私”的“肉欲之爱”,具有更广大的精神性“爱根者,磅礴蟠护于个人、国家上,而为吸群之利器、铸国之胶质者也”<sup>[28]</sup>。在他看来,这种博爱精神为西方女子所具备,而正是中国女子所匮乏的品格,因此他要求中国女子将一己私情升华为爱群、爱国、爱种的宏大情感,以此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要而言之,塑造女性的“公爱”精神已超越个人品德范畴,而被提升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追求现代性的重要部分。《妇女杂志》也延续了这种将女性之“爱”从私人领域引向公共关怀的话语,并曾刊文盛赞欧美妇女“爱社会,即所以期国家的进步和发达”,直指此种公共精神正是中国妇女所匮乏的现代性要素<sup>[29]</sup>。

《妇女杂志》引入的西方女性典范,明显体现出一种“去私情、存公爱”的价值取向。以玛丽·丽安为例,她抱定“女子之人格由此益高,国家之

文明亦因此日进”<sup>[26]</sup>的崇高目标,克服万难创办蒙特霍利约克女子高等学校(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sup>①</sup>,甘愿“牺牲其室家之乐,而为他人造幸福”<sup>[21]</sup>,将个人情感让位于公共贡献。为凸显她爱国奉献、牺牲自我精神的权威认同和社会影响,《美国女教育家密里来恩传》中刻意增添了她去世后“哀嚎之声不绝于美都者三日”,并获美国总统敕封“全美国之母”<sup>[30]</sup>的情节——尽管事实上其墓碑仅标示其创办者身份,并无此类誉辞。此类借助“总统”背书与“国民之母”传统荣誉的改写策略,为其形象注入了国家层面的崇高意义,从而将这位西方典范有效纳入国族主义叙事框架,塑造符合民族国家需要的、具备爱国与救世品格的新女性。类似改写亦见于对丽安个人特质的描述:She is all intellect, (and) she does not know that she has a body to care for.<sup>[20]124</sup>而译文则转化为“丽安女士谋人太忠,谋己则拙。殆将牺牲其身于社会矣”<sup>[21]</sup>。这种改写将其形象从西方语境下的才智和奋斗,转化为无私奉献与牺牲精神,弱化了个人主义的学者特质,强化了集体本位的德行色彩。

这种对“博爱无私”形象的推崇与重构,既吸纳了西方女性公共参与的现代实践,也是在近代救亡语境下对儒家“天下为公”“舍己为群”等观念的再阐释与性别化延伸。而“国民之母”的概念,也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丁祖荫等人对塑造女子奉献社会品格的倡导。“国民之母”与“贤妻良母”是相沟通的,因为它仍保留了女性作为母亲的家庭角色,然而,它在履行家庭职责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民族与国家的责任,其活动场域也不再局限于家庭内部,而是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这些国族话语在激发女性投身社会改革的同时,也延续了将女性工具化为国家治理与种族振兴资源的传统思维。

## (三) 持家之责:兼顾职业与家庭角色

妇女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实践,深刻地形塑女性的社会形象,并参与整个性别话语的建构。传统礼教将家庭建构为女性唯一正当的活动空间,相夫教子、主持中馈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女子的天职。无独有偶,在18、19世纪的西方社会,持家育子同样被奉为理想女性的核心美德。即便是

<sup>①</sup>该校创办于1837年,是美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983年学校更名为蒙特霍利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现为美国顶尖文理学院之一。

在公共领域取得成就的西方女杰,其家庭角色实践仍揭示了职业女性普遍承受的“双重负担”:她们既需开拓事业,又被传统性别话语束缚于主妇职责之中。这一形象特质在《妇女杂志》的译介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传达,甚至有所强化。

无论是教育家、科学家还是慈善家,其公共成就往往与其家庭实践并置,家庭责任被描绘为她们不可回避甚至应当承担的“本分”。例如,丽安女士“年十三,即习于劳动,业浣濯缝纫,以佐其母为生活”<sup>[26]</sup>;密且尔女士“虽致志于学,其家庭琐屑之事,亦未尝废弛,常为老父织袜制衣,且织且读”<sup>[27]</sup>;弗来女士“既须部署一家之事,又有儿女十余人以累之”,“然以弗来女士之为人,有果毅勇往之概,则世无不能为之事”<sup>[24]</sup>;爱伦·凯女士自幼即谙熟持家之道,“其母之教授女史也,尤注重于女子家庭上必要之技术。故处世之方,治家之道,女史幼时已深悉其底蕴矣。……整理烘焙,清洁食桌,无不女史自为之”<sup>[16]</sup>。这类描述不仅在重申女性对家庭的职责,更通过将持家塑造为女杰个人才能的展现,巧妙地美化了女性家庭角色。对家庭职责的期待在《爱伦·凯女史传》对爱伦·凯的形象改写中得到鲜明体现。文章称其“日居学校,出其学说,以授学子,晚返家庭,用其原理以育子女”<sup>[16]</sup>,描绘出事业家庭两不误的女杰形象。然而事实上,爱伦·凯并未结婚成家,亦无子女。这一改写似乎意在强调,职业与家庭可以和谐共存,新女性不应放弃婚育和家庭,而应该以现代知识反哺传统职责。这一立场与五四后杂志将爱伦·凯不婚不育归因于婚育会影响知识生产的立场截然相反<sup>[31]</sup>。

译介中对西方女杰勤勉持家的品格凸显,在美化和固化妇女持家责任的同时,也构想出一种新型的现代女性形象,正如此前胡彬夏所倡导的理想女性一样:出走的“娜拉”并非理想的新女性,能同时驾驭公私领域的女性才堪称典范。此举在形式上打破了“贤妻良母”与职业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其深层意识形态功能却在于调和现代性带来的性别角色张力:它在认可女性社会价值的同时,重新确认并美化了其传统家庭责任的重要地位,使“贤妻良母”的伦理框架得以在现代语境中延续与再生。因此,女性的社会进步被巧妙地融入既有的伦理秩序之内,其在事业上的成就非但不构成对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反而成为维系与强化家庭角色的一种

延伸与证明。

在政治高压与妇女解放呼声渐趋式微的民国初年,《妇女杂志》(1915—1920)在“贤妻良母”宗旨主导下展开的西方女杰形象译介,并非单纯的文化传播,更是一场在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之间进行的形象改写与重构。杂志通过对西方女杰的时代与职业身份的有意筛选,以及在翻译过程中对妇女公、私道德与家庭角色的突出强化,将原本多元的西方女性典范重构为一种兼具公益奉献、社会参与等现代性特质,又调和当时中国性别秩序与文化道德规范的“贤德齐家型女杰”。在保守的外表之下,这种形象重构实现了有限度的妇女启蒙:一方面为中国女性走出闺门、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道德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公共参与限定在家庭化与伦理化的框架之内,反映出民国初年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既欲推动变革又忧惧失序的复杂心态。《妇女杂志》此时期对西方女杰的形象译介与重构因此成为观察近代女性启蒙运动的重要个案——它既非彻底的保守,也非纯粹的进步,而是一种在张力与妥协中展开的文化实践。这一实践揭示了性别解放初期的历史局限,同时也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调适与再造,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 参考文献:

- [1]夏晓虹.晚清女报中的西方女杰——明治“妇人立志”读物的中国之旅[J].文史哲,2012(4).
- [2]江勇振.女性、母性与生物界通律《妇女杂志》的前半期(1915—1925)[C]//王政,高彦彦.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3]任淑静.《妇女杂志》(1915—1919)英美作品译介中女性形象的构建[D].贵阳:贵州大学,2009.
- [4]张会丽.《妇女杂志》中的科学家形象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11).
-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袁世凯颁定教育宗旨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6]许慧琦.“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
- [7]妇女杂志四卷大刷新广告[J].妇女杂志,1917(12).
- [8]茅盾.商务印刷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C]//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9]彬夏.何者为吾妇女今后五十年内之职务[J].妇女杂志,1916(6).

- [10]胡彬夏.基础之基础[J].妇女杂志,1916(8).
- [11]胡彬夏.二十世纪之新女子[J].妇女杂志,1916(1).
- [12]Patmore C. *The Angel in the House* [M].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imited, 1887.
- [13]Welter B. *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 1820—1860* [J]. *American Quarterly*, 1966(18).
- [14]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15]陈铨乐.译介新女子:中国女权主义者眼中的西方(1905—1915)[C]//王政,高彦颐.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16]袁念茹.爱伦斡女史传[J].妇女杂志,1919(2).
- [17]瑞华.敬告女学生[J].妇女杂志,1915(7).
- [18]丁逢甲.女界箴言[J].妇女杂志,1918(2).
- [19]丁逢甲.女界箴言[J].妇女杂志,1918(3).
- [20]Bolton S K. *Lives of Girls Who Became Famous* [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Co., 13 Astor Place. 1886.
- [21]Bolton S K.高君珊,译.泰西列女传:丽安女士传[J].妇女杂志,1917(9).
- [22]Bolton S K.高君珊,译.泰西列女传:爱梨阿脱女士传[J].妇女杂志,1917(10).
- [23]健孟.英国女权运动的先驱[J].妇女杂志,1923(1).
- [24]Bolton S K.高君珊,译.泰西列女传:弗来女士传[J].妇女杂志,1917(12).
- [25]西神.谈屑:内助[J].妇女杂志,1920(3).
- [26]淑明,译.美国教育家梨痕女士传[J].妇女杂志,1916(12).
- [27]Bolton S K.高君珊,译.泰西列女传:密且尔女士传[J].妇女杂志,1917(6).
- [28]初我.哀女种[J].女子世界,1904(6).
- [29]谷青.欧美妇人与社会事业[J].妇女杂志,1920(12).
- [30]杨祥麟.美国女教育家密里来恩传[J].妇女杂志,1916(3).
- [31]原田实.幼彤,译.唱母性尊重论的爱伦·凯女士为什么单身[J].妇女杂志,1922(10).

##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and Reconfiguration of Western Elite Women Images in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0)

ZHAO Gongcui, MA Shik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lite women images in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20), shaped by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ime and guided by the journal's core tenet of "Virtuous Wife and Wise Mother", reconstructed the imagination of female modernity where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tertwined. In terms of the selection, the journal focused on the female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ho were active in non-political fields such as education, art, science, and philanthropy, thereby shaping the moderate and conservative female exemplars. In the journal'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practice, methods of addition, deletion, adaptation, etc. were frequently employed to highlight these women's distinctive traits of moral integrity, philanthropic dedication, and their ability to balanc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The above-mentioned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images were essentially a product of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norm of "Virtuous Wife and Wise Mother" and a modern consciousness of women's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y expanded women's public spheres in the name of social contribution, while simultaneously maintaining the existing gender order through an emphasis on domestic duties and traditional morality.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lite women images thus served not only a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ut also as deeper cultural negotiation an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reflecting the complex undertaking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reconfiguring ideal female images amid the dilemma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Key words:** *The Ladies' Journal*; Western elite women; imag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reconfiguration  
(责任编辑 合壹; 实习编辑 李泓晓)